



哲 人
哲 思

燕园沉思

朱德生著



燕园沉思

未名湖畔
哲学沉思录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683539

B08

Z830



哲 人

哲

思

燕园沉思

朱德生著



燕园沉思录
湖畔的哲学

868353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园沉思:未名湖畔哲学思考录/朱德生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哲人哲思;4)

ISBN 7-5006-3728-4

I. 燕… II. 朱… III. ①朱德生-文集②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891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6.75 印张 2 插页 144 千字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10.80 元

燕园沉思 (引言)



湖光塔影，倒影成趣。这是北京大学的象征。近半个世纪的学习哲学的生涯，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未名湖得名而未名，充分体现了哲理的智慧。因此，确切的书名应叫《未名湖畔的反思》。现应简化之求而名《燕园沉思》。

1952年岁末，全校师生曾在未名湖冰上举行过新北大的第一次除旧迎新晚会。年轻的学子们，通宵达旦，尽情狂欢，都以为自己已进入了知识的海洋、科学的殿堂，前途就像聚光灯照耀着一般光明，脚下的道路就像未名湖的冰面一样平坦……没有人在思考：结冰意味着严寒；一旦严寒过去，冰层便会融化……

1994年哲学系80周年系庆。毕业39周年的部分同班同学，又聚到了未名湖边。当年诗情画意的情感、真理就在我手中的气概都没

有了，正如袁隋园所说：“当年雄心易消尽，送来老字例难辞。”话题更多的是几十年怎么过来的，目前生活得怎样，家庭孩子又如何等等。因此很自然地便会互相追问，今天没有来的同学又在哪里？是不是尚在人间呢？……对此我心底不禁升起一股凉意。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不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呢？……

我偶然走上了哲学之路，却又爱上了哲学，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学到了哲学。这就是我要反思的。我相信，这个课题对于我的同学、对于我的同时代人有某种普遍性。如果这种反思是符合科学良心和理论的原则性的，那么，我们的后人也会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我也有过青年时代，也和很多青年人一样有过美丽的幻想。我幻想过要创

造新的理论。人不能没有幻想。没有幻想的生活，便是暗淡无光的生活；没有幻想的生活，便是没有前进动力的生活。但人终究不能仅仅生活在幻想之中，而是要面对现实。创造的源泉不在幻想中，而在现实生活中。所以，现在我只相信一条：哲学也与文学一样，不能无病呻吟。有病呻吟会得到别人的同情与共鸣；无病呻吟只会引起旁人反感和厌恶。

我曾经多次问过听我课的研究生朋友：你们的理论思维水平比亚里士多德低还是高？大家不回答。我说：说高不好意思，说低总不至于吧。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比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文明不知高出多少倍了，我们的理论思维水平怎么会低于亚里士多德呢？如果我们的水平高于亚里士多德，那么，为什么大家仍然要念亚里士多德

的著作，而我们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品却没有读者。这是为什么呢？这可能是近半个世纪来，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的病因之所在。

我不敢奢望有什么创造，只希望对既往作一点反思与忏悔。

目录

第一辑

走哲学之路 1

01 选择了哲学/1

- 1.1 走进哲学系之后
- 1.2 科研上的转向
- 1.3 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 1.4 发扬独立研究的精神

第二辑

路在何方 13

02 哲学与现实/14

- 2.1 理论认识本质上是批判的
- 2.2 必然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03 哲学与群众/25

- 3.1 能人人都当哲学家吗
- 3.2 冷静思考哲学遭冷遇
- 3.3 不要把一切局限性都归结为
阶级局限性

04 学风与人品/37

- 4.1 学者要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 4.2 治学之道在于先治人
- 4.3 无私即要淡泊名利
- 4.4 无畏的重点在不“为权者讳”

05 哲学与传统/47

- 5.1 内在与外在的矛盾
- 5.2 给定与超越的矛盾
- 5.3 古与今的矛盾

06 哲学与科学/67

- 6.1 研究对象的不同
- 6.2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辩证的
- 6.3 不应把辩证法等同于实证方法
- 6.4 抽象不等于脱离实际

第三辑



路在脚下 84

07 思维与存在关系再思考/86

- 7.1 由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发展
- 7.2 由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倒退

08 为我关系浅议/104

- 8.1 为我关系即实践关系
- 8.2 主客体的分化与相互生成
- 8.3 主客体的二重化

09 为我关系续谈/118

- 9.1 “我”是人类能动性的抽象表达
- 9.2 实践是人类能动性的客观表达

10 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131

- 10.1 由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转变
源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提出
- 10.2 否定了思维与存在关系便会
曲解辩证法

11 对辩证法的几点思考/153

- 11.1 辩证规律的客观性
- 11.2 辩证法是人存在方式的反映
- 11.3 辩证法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

12 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168

- 12.1 古代形而上学为什么会走向
自我否定
- 12.2 孕育于旧形而上学的方法在
反形而上学思潮中成熟
- 12.3 辩证法即实践基础上的本体
论和认识论统一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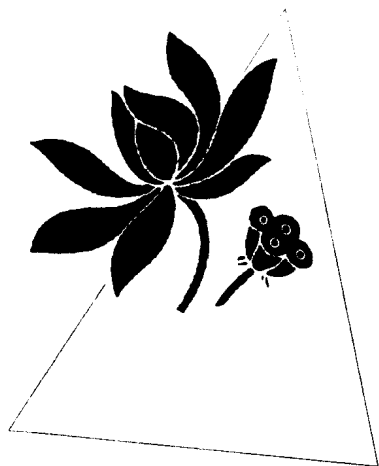
13 形而上学的召唤/189

- 13.1 再树形而上学的权威
- 13.2 新的形而上学即存在论和认
识论辩证统一的理论



后记/203

主要参考书目/206



01 选择了哲学

在高中时,我喜欢的是文学。可能因为当时学校图书馆的中外文学名著较多,看的也较多,便产生了兴趣。因而幻想过要当作家。“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我在旧书堆中扫出了几篇高中时的作文,读来仍不无兴趣。如1948年在一篇题为《冬》的习作中,只有开篇的一句话(“严寒的冬天过去了便是春天”)谈到了冬天,全篇数千字谈的都是春天。而且字面上谈的是自然气候,实际上谈的却是政治气候。这可能是后来我转向哲学的内在原因。自发的对旧

社会的批判精神,正符合 20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

1.1 走进哲学系之后

当然上大学时,我进了哲学系,还有一些外在的诱因。

高中时,有位老师叫陈志安(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苏州大学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已故),给我们讲中外历史、地理。在历史课中,他常常谈古论今、夹叙夹议,讲得很生动,同学们都很爱听。有一次他在中国历史课的课堂上,讲了一通程、朱、陆、王之争。说王阳明认为:“不在此山中,焉知此花红。”当时讲的内容我并不全懂,但讲王阳明的那句话,却给我留下了终身不忘的印象。因为它令我十分惊奇,即本来在生活中不成为问题的事,让他这么一说,却成了不解之谜。要说此话对吧,不行,红花不能因为我不看它便不红了;要说此话不对吧,也不行,因为我根本没有见过它,怎么知道它是红的呢?……这就是我第一次听讲哲学,第一次知道有哲学学科,而且觉得它比文学更耐人寻味。刚好1949年毕业前夕,常州市解放了,我又偶然在书店买了本小书叫《意识形态》。回到乡下后,乡政府组织我们学习,我提到这本小册子,大家要我介绍,我不得不认真阅读。读来颇感新奇。就是这些原因,使我在考大学时的入学志愿表上,未经深思就填上了“哲学”两字,真的也就走上了学哲学之路。

在南京大学的一年,学到了点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有两件事印象十分深刻:一是“三反五反”,二是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是当时的主课。“三反五反”主要是上街搞宣传,在校内也批斗了个别教工。思想改造则不同了,没有一个教员能幸免。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也要人人过关,然后集中力量去“帮助”教员,即参加批判教师的大会。

正是在这些政治运动的前提下,1952年夏,实行了全国高校的院系大调整。全国的哲学系都集中到了北京大学。那年刚好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北京举行,所以当年的国庆特别热闹。原北大哲学系的同学,为使外地同学能目睹国庆盛况,要求我们九月底以前赶到北京。天安门的狂欢之夜,第一次使我体验到了何谓狂欢。不过更令我兴奋的是来到了全国的最高学府。哲学系更是如此,这是全国惟一的哲学系。哲学界的名教授都集中在这里了。可惜在教学和科研中都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应有的作用。

当时给我们主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是艾思奇。他在中央党校工作,到北大来兼课。主讲中国哲学史的是冯友兰和张岱年。主讲逻辑学的是王宪钧。这是本科时给我印象较深的三门课。收获最大的自以为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从中似乎懂得了什么是哲学,什么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例如“不在此山中,焉知此花红”便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西方哲学史这门课当时还没有开。接着上研究生班,我的专业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研究生毕业时,我却选择了西方哲学史作为工作专业。所学非所干,所干非所学,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我一种强烈的印象,它即是一种政治理论,而且只有领袖人物对此才有发言权,其他的人只能对他们的言论与理论作点宣传注释而已。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中,我只能听别人说,或说别人说的,没有我说的余地,那怎么谈得上研究呢?因此,要想研究哲学便得另找出路。结果便找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密切的西方哲学史。

现在的青年人,可能会以为我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一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某种怀疑了。恰恰相反,当时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得很崇高,不是一般的小老百姓能研究得了的,而我又不愿从事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因而只能另找出路。

1.2 科研上的转向

在独立学习哲学的道路上,我走过一条“之”字形的道路。即在“文革”后,我又由历史的研究转向了理论的研究。这是为什么呢?它是由于三件事情引起了我对现状的反思,导致了科学研究上的新的转向。

一是“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文革”开始时,我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落伍了,所以拼命学习毛泽东著作。凡不见之于《毛泽东选集》的毛泽东的作品,不论是电文、书信、文稿、语录……,有字必录,积累了有一两公斤活页纸的笔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经常想,目前的搞法是符合唯物主

义和辩证法的吗?“文革”前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事实上却是批评一次,更猖獗、更横行一次。“文革”中那种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做法,可以说把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推到了顶点。为什么理论和实践会如此二律背反呢?是不是我们的理论本身便有点问题呢?是不是我们理解的唯物论不够唯物、我们理解的辩证法不够辩证呢?

二是毛泽东与威尔科克斯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他老人家说辩证法只有一条规律,即对立统一的规律。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反思。在本科时,我们的学习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小册子为范本。1953年斯大林病故了,世界各地发生了所谓反斯大林运动。我国的最高领导是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但在研究生课程中,学习唯物辩证法不再按斯大林说的四条讲了,而是按照恩格斯说的三大规律讲。现在毛泽东又说只有一条。那么唯物辩证法到底有确定性没有?这种确定性的客观根据何在?为什么我们的教科书和专著中都没有探讨这些问题呢?

三是所谓“批儒评法”。原来在理论界一直有一种默认的共识,即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搞历史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因为:原理涉及的都是现实的问题,稍不小心,便可能犯错误;历史谈的都是古人、死人和陈年往事,可以无忌地任人评说。现在却一反常规,历史问题成了最现实的问题了。在这里,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历史问题本质上是个现实问题,不可能有纯粹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研究要搞好实际上取决于原理。而且我相信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是历史的产物。搞历史最终是为提出和论证某种理论。

所以,“文革”后我认定了史论结合的道路,以研究历史为手段,以探讨理论为目的。对以往以为理解了的问题,重新进行反思;对以往没有学习的东西重新开始学习。

本来这种科研上的转向,纯粹是个人的事,而且也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触犯某些人的痛处。可能是因为我发现了某些被他们认为是究竟至极的真理并不那么可靠。于是,他们使用“文革”前常见的极其“光明”的手段,必欲置我于绝境而后快。我觉得可笑。真理会因为遭到诽谤而转变为谬误吗?他们忘了,热衷于一时名利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有一句共同的箴言,即要学会做学问,先要学会做人。所以,面对别人暗算得逞了的微笑,我仍然在冷静地反思、真诚地忏悔。

1.3 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我仍然相信这一学说。不过我相信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新思潮(即马克思主义)的优点不是要颁布适合于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的永恒真理的教条,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这就是我相信的最高真理。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精神。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谈到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时也说过,人类无论在认识的领域还是在实践的领域,永远不会达到如下的一步,

即除了望着已经发现的绝对真理发呆以外,再也无法前进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只是指出了一条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的道路。

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并不是说,我就认为真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在科学中认为真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人,一定没有掌握多少真理,甚至根本没有掌握真理。因为这种精神不是科学的精神,而是神学的精神。“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皇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政治上尚且要允许有党有派,更何况学术上呢?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不同意见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你不允许它存在,它只是不公开发表而已,并不是不存在。正确的意见要克服错误的意见,还是要通过公开的说理的辩论才能达到。人文社会科学要发展、要进步,就要允许有不同的学派,要提倡百家争鸣。

在哲学科学的事业中更要提倡一种宽容的精神。这是哲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稍稍了解一点哲学史便会发现,现代哲学中所争论的问题,有不少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便在争论了。有的可能当时以为争论清楚了,今天又重启争端。例如哲学研究什么便是这样的问题。哲学是一门最古老的学科,发展了两千多年,却仍然在争论哲学研究什么,那又有什么进步可言呢?不。哲学的进步恰恰便表现在这种不断的重新争论中。这是因为哲学不是对外部世界(人也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的直接性的认识,是对这种直接的实证知识的再认识。而这种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当然是不同的。所以前代人以为争论清楚了,后代人必然还要重新争论。也就是说,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